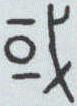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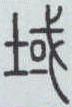
**nation (state)/国(Guó)**

|  |  |  |
| --- | --- | --- |
| Chinese Perspective | HUANG Ping, LAU Kin-chi | 27 May 2022 |

1949年以来的现代汉语中的“国”(國)，是与英语中的nation, state, country, land, home, people等多个词汇相连,或更多是它们的复合，而非其中任何一个单一词汇之意。

“国”在中文里可以一直追溯到周朝(公元前1046-256)的时候。它的初文是“[或](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6/4890354"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_blank)”（“域”的古字），本义是“邦国”、“封邑”。其构形里有土地（“一”），也有护卫土地的武器（“戈”）。到了周代晚期（亦有说秦汉以后），“或”因借用为或然之“或”及疑惑之“或”，就在外面加了个“囗（wéi）”，表示疆土地域的范围，读作了guó。秦代的小篆也继承了金文的形体，后来隶书就变为定型的方块字”國”了。

IMG_256   

（以上从左到右：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的“国”字写法举例）

“国”或者“邦”有大小之分，小为国，大为邦，两者皆不仅指土地或领地（《周礼·太宰》：“以佐王治邦国。”郑玄注曰：“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而也包含治理这块土地的方式。例如《周礼·地官·掌节》就曰“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再如《尚书·五子之歌》里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传》则说“言人君当固民以安国。”

到了战国时期 (公元前475-221)，不仅一个接一个的战争频繁发生，也由于战争发生于诸国之间，故称之为“战国”或战国时期。当然，这个时期也是著名的思想繁荣阶段，如“诸子百家”中的庄子和孟子就生活在这个时期，他们和他们之前的老子和孔子，都对国之为国有过诸多至今仍影响甚大的阐述。

从那以来，很多世纪过去了，但是“国”一直都是中文世界里最为重要的社会单位，这里，政治秩序和领土安全甚至远比族群或文化起源都更加被看重，尽管古代的“国”就其领域而言比今天的要小得多，而且早期的国总是与家族联系在一起，故“国”更多时候是用家族的姓氏（而不是所处的地点）来命名的。由此也可见人在国中之重要性：是谁比在哪更加关键。

家或家族的社会关系是人们生活于区域或领地的真正渊源，这也是一些人即使一时离开（甚至长期乃至终生离开）后仍然视自己为该国人的原因。这种家族的社会关系绑定直接体现就是国之为国，故后世之人就以此被视为或自视为属于该国之人，直到今天可以说也还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国总是与“家”、“民”、“土”联系在一起，并因此有了“国家”、“国民”、“国土”等基本概念。

这种看似再自然不过的家与国的联系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自从古代中国有文字历史以来，“国”就既与领地更与亲属以及邻居密切相关，这样，各个家和其成员也与其所在的邻里、村庄、市镇，一直到他们所在的民族、国家、祖国及其治理方式紧密相连。实际上，人口越多、领土越大，人们与国的关系也越多、越深。

在现代汉语里，与“国”相关的词汇用的最多的应该是“国家”，它今天似乎与英语里的nation-state很接近，但是实际上它本身的含义是“国和家”的复合体，即国是更大的家、大家的家，这里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大家庭，故才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说（《论语》）。这是中国传统里把人们从家到国（乃至于“四海”）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即是说，人首先是一家之人，然后是一国之人，甚至是四海和天下之人。

当然，同样也可以反过来说，无天下即无国家，无国家即无小家，无小家即无个人。

现代汉语里另一个与“国”密切相关的词是“民族”或“国族”（英语里的Nation），这个词的当代用法最早是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例如1899年梁启超（1873-1929)在他的《东籍⽉旦》中就第一次使⽤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词（他在评介当时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时称这些论著“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乃能⾔之详尽焉”。）他那时更看重的是东西之别，并用“民族”来强调中国需自强并在与西方竞争中如何立于不败。1905年，梁启超⼜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华民族⾃始本⾮⼀族，实由多民族混合⽽成”。

“民”在汉语里当然是指民众，“族”则更多是指总体的中国人。不过，梁启超才是最早试图阐述民族或中华民族的人。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上世史，⾃黄帝以迄秦之⼀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发达、⾃竞争、⾃团结之时代也；第⼆，中世史，⾃秦统⼀后⾄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乾隆末年以⾄于今⽇，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梁启超，1901，《中国史叙论》） 在梁启超之后，孙中山在《三民主义》 中明确把血缘、生活方式、语言、信念、习俗，以及地域等作为一个民族之成为民族之必要条件。

现当代中国更系统也有影响地阐释国家、民族的是毛泽东。从1920-1930年代起，他就把人民和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并认为人民只有组织成为一个新的现代民族才能获得、恢复或捍卫自己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也才能得到解放或解放自己，从而实现孙中山当初憧憬的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毫无疑问，中文里的“国”是国家、民族、祖国、领土、政权、人民之综合，对其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就如同动员与治理如此巨大的人口与漫长历史的社会与政治的综合体一样，是一个复合的过程。

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很类似近现代汉语中的政治词汇中思想家们所说的“大我”与“小我”，或者说，在大一统之下如何妥善处理好国与人的关系，这与国之大者和民之丰富也密切相关。现实中它们的相互关系既体现在孟子当年著名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也体现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更大的统一体（“国”）中，这也成了毛泽东如何看待人民与国家之辩证关系的基础和依据。

今天，一种非常受到重视的理解国之统一性与复杂性的学理性路径是费孝通晚年多此强调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自晚清以来，作为一个正走向现代的国家，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和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其完善也是相辅相成的，1949年以后尤其是如此：一方面，它意味着把各个不同的族群都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之下，这个过程只是部分地受到苏联的影响，例如1950年代（乃至那以后）把不同的族群也称呼为“民族”；另一方面，它也将各种现代制度引入或改善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比如国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当然还有现代国家的外交与国防等。

对于社会学家和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国家”一词可以用来指称西方意义上的 nation 或 state，而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学者则更多把它看成是政府或政权，而在它的背后，很多时候汉语里的“国家”又意味着“社会”，或者说，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国家（或社会）的存在是必需的：认同感，其给与它的成员以成为或属于一国之人的依据；安全感，其提供给它的成员以“到家了”或“回家了”的心理；凝聚力，其确保它的成员平时多数时候相安无事，但如遇外部危险或内部压力却能够团结一致。

显而易见，中文里的“国”概念不仅因为其漫长的历史而且因为其复杂的内涵而不能简单翻译为英语里的nation或state，很多时候“国”更是在讲民众、人民或者他们的家园，无论他们是个人、是家庭的成员，还是他们所属的领土、国别、国体，乃至四海或天下。在这样一种由小及大的网络化结构里，“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理念和框架，其将个人通过家庭、社区、国家和全社会、全天下都勾连起来，这里甚至也很难只存在一种区分谁比谁更重要的单一标准。

参考阅读：

1. 牛新春：对“民族”概念的一些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9第11期，北京；
2. 【德】李博（WOLFGANG LIPPERT）：《汉语中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ENTSTEHUNG UND FUNKTION EINIGER CHINESISCHER MARXISTISCHER TERMINI）,200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